

博雅

博雅文学论丛

公寓里的塔

1920年代中国的
文学与青年



姜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公寓里的塔

1920年代中国的
文学与青年

姜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姜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6021-0

I. ①公… II. ①姜…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7137号

- | | |
|-------|---|
| 书 名 | 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 |
| 著作责任者 | 姜 涛 著 |
| 责任编辑 | 张雅秋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021-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45307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1.5印张 362千字 |
| |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5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	1
第一章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下的文学“志业”理念	24
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理念	
——围绕文学研究会“前史”的讨论	27
“纸上的事业”之“修正”	28
“社会学”抑或“文学”	35
同业联合的意识	41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	45
“劳动”的隐喻	
——叶圣陶《苦菜》及其他	49
新村运动与“菜园”空间	51
“劳动”中的身体直观	56
作为“志业”想象的“劳动”	59
第二章 新诗“装置”的内外	
——早期白话诗的政治与美学	66
“场”的混杂	
——以“《星期评论》之群”为讨论个案	67
“劳动问题”与新诗写作	68
“政治场”中的“文学场”	77
“超现实”的说理空间	84
从《小河》到“病中的诗”	
——周作人眼中的新诗及其他	92

“病中的诗”之发动	93
“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	98
“小诗”中的平凡实感	104
“杂诗”与“忧惧”	108

第三章 从绿波社到无须社

——“文学青年”的聚合、位置及人格造型	114
“绿波社”与文学青年的“大联合”	115
无须存在的“无须社”	121
学院、报刊及公寓空间	125
文坛上的“电气网”	131
于赓虞：感伤的“个人发现”	138
诗人人格：“合群”或“独在”	146

第四章 公寓内的文学认同

——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	151
在“那么一个公式”之外	152
从西西会馆到沙滩公寓	157
“公寓困守”与“街道漫游”	166
在井中向群星的仰望	174
写作者形象的凸显	180

第五章 “室内的作者”与19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

“幸福的家庭”与“幸福的写作”	186
居室环境的隐喻	191
“硬写”的幽闭	196
陈毅：“室中旅行法”	202
丁玲：迎向更大的理性	211
沈从文：“间离”的作者意识	223

第六章 “教训”与“反教训”

——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	236
“老实说了吧”前后	236
“变态”社会中的“常态”构想	242
“常态”背后的知识体制	247
“水平线”的上下	251
鲁迅的表态	256
“新流氓主义”	262
“思想革命”之再起?	268

第七章 革命动员中的文学、知识与青年

——从1920年代《中国青年》对文学的“批判”谈起	276
“文学运动”还是“实际运动”	278
什么样的知识最紧迫	285
“为他人”还是“为自己”	294
从“诗的生活”到“方程式的生活”	304
结 语	314

主要参考文献	319
--------------	-----

后 记	337
-----------	-----

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

从代际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是一种颇为常见的叙述。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1936年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几次谈及“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即写一部有关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①这个宏大的计划甚至有了雏形（“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可惜最终没机会完成。^②接续鲁迅的思路，后来李泽厚提出，可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这六代人“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③

无论“四代”，还是“六代”，上面的代际划分都着眼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并非只是依据自然的年龄差异，“辛亥”“五四”“大革命”等一系列称谓，也意味着每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行动取向呈现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为情境中的思想和事件所塑造、凝聚。如果进一步探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冯雪峰忆鲁迅》，第10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按照王瑶的说法，这个题材在鲁迅的作品中已有表现，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形象，可以看作“章太炎先生一代”的代表；鲁迅自己以及《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则属于“第二代”知识分子；《伤逝》中的涓生和《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应该属于所谓“第三代”。参见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第16—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③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可以参照的是，许纪霖也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讨,这一话题涉及的层次可能相当复杂,比如:“同一代人”的意识,往往与共同经历的事件相关,而对待同一事件相异的态度及“位置感”,又决定了不同的“代”的感受和认同。^①再如,代际划分一方面指向历史的线性展开,但不能忽略的是,不同代际群体在同一时代的共同在场及相互关系,也会暗中塑造内在的历史结构。在思想文化剧烈变动的五四时期,“新与老”“长与幼”“师与生”之间的冲突或协作,就是新文化运动基本的展开模式,在相关的著述中,这一点也会经常被谈及。^②

具体到发生期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三代人的相继“登场”及共同“在场”。1922年,胡适在为少年诗人汪静之《蕙的风》所作序言中,就提出了这种划分:

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

.....

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很深(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比较更容易。

.....

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③

三个阶段的衔接,构成了新诗从旧诗中“破茧而出”的解放历程,有关新文学发生期“三代人”的分别,其实也包含在这一论述中:除了

^① 对于“代际”问题的理论辨析,参见卡尔·曼海姆:《代问题》,《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第65—11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舒衡哲有关《新青年》群体(“先生一代”)与新潮社群体(“学生一代”)关系的讨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参阅薇拉·施瓦支(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第67—11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胡适:《〈蕙的风〉序》,《胡适文存二集》第4卷,第29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我们”——《新青年》的元老们，“他们”——康白情、俞平伯等新潮社成员，胡适已将五四之后涌现的、比新潮社成员更为年轻的一代，如汪静之这样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纳入到代际的考察中，这恰好对应于鲁迅所言四代知识分子之中的后三代人。

在稳定、静态的社会中，代际之间的交替，会按“新陈代谢”的自然节奏进行，衰老者退阵，新健者入伍，在剧烈的历史变动期，“代”的更迭速率，往往会骤然加快。五四前后，新文学“三代同堂”的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①当然，“三代人”的关系不是替代性的，前辈与后辈、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指导、提携与合作，但不同的年龄和身份，不同的教养和资源，以及参与历史时机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位置并不一致，与文学的关联方式，乃至人格的造型，也迥然相异，新文学自身“场域”的生成与变动，也就发生于这三代人相继的“登场”“退场”或共同的“在场”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以代际为视角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发生，其目的不是要再度勾勒线性的“解放”图像，能否在起点上形成一种内部相对化的视野，呈现“过程”之中交织的不同方法、路径和可能，或许才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

先看以《新青年》诸公为代表的“先生一代”。他们大多出生在 19 世纪的 80 年代：陈独秀（1879 年）、李大钊（1889 年）、鲁迅（1881 年）、周作人（1885 年）、高一涵（1885 年）、钱玄同（1887 年）、沈尹默（1883 年）、刘半农（1891 年）、胡适（1891 年）。除刘半农、胡适的年纪较轻外，几位“元老”均出生于 19 世纪 80 年代，即便是他们的反对者，如章士钊（1881 年）、黄侃（1886 年）等，也多是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一批 19 世纪“80 后”共同的作品。在知识背景上，这批“80 后”都接受过传统的古典教育，有的还获得过

^① 1932 年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 年）中，就曾引述陈衡哲的说法，感叹新文学的开创者们已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功名”，但同时又是进入新式学堂的一代，不少人曾留学国外。与康有为、章太炎等前辈学人比，这代人在当时虽然没有显赫的学术地位，但也都术业有专攻，甚至是各自领域的权威。^① 新旧兼备、视野开阔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在后来的一系列历史变动中，往往能占据优势，得风气之先。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新青年》群体之前，诸位“先生”或多或少都有历史参与的丰富经验，涉及政治、教育、出版等诸多领域。陈万雄就通过考察《新青年》群体的履历，勾勒出五四新文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反清或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五四与辛亥不是两代人，在人物谱系上有着直接的渊源。特殊的历史处境造就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性格，这批新文化的倡导者们，虽然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即便一路革命不息的陈独秀也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一种强烈的国族、伦理关怀，仍贯穿于他们的思考与实践。在五四之前，他们集体转向文化事业，也与民国“共和”的危机以及一系列政治实践的挫败相关，因而“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② 在这个群体中，对于文艺有精深体知的周氏兄弟，无疑代表了另外一种向度，但他们的文学思考和实践，简言之，并未发生于文学与政治的现代分化之中，与政治保持某种互为根底、内在开放的“矛盾的同一”状态，恰恰构成了其文学方式的独特性所在。1918年，兄弟二人加入起先并不看好的《新青年》阵营，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1917年张勋复辟之后产生的觉悟。^③

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氏兄弟等《新青年》诸公，构成了

① 在文学革命的发端时期，钱玄同等一批“章门弟子”的加入，就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17年初，陈独秀收到钱玄同支持新文学的书信后，颇为激动地回应：“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独秀：《复钱玄同》，《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②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③ 周作人后来谈到这段往事时曾说：“经过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其次是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钱玄同的诨名）的劝架，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第383—38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缔造新文学的“先生一代”，那么随后加入的“学生一代”，在构成上要相对复杂一些，包含了更多的文化群体。仅在北京一地，除了与《新青年》一脉相承的新潮社之外，类似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新文化团体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国民社、实社、工学社、曙光社、社会实进社等，在新文学的发生期，其中至少有两个，起到过关键的作用：一个无疑是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新潮社，依照傅斯年的说法，《新潮》创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①，最初的白话诗人和小说家，也出现在这个群体之中；另一个则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加入社会实进社后组成的“小单位”，他们曾先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后来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上述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② 以这两个群体的成员为例，或许可以大致把握新文学发生期“学生一代”的基本形象。

首先，还是从年龄上看，两个群体成员几乎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比“先生一代”刚好晚了十年：傅斯年（1896年），罗家伦（1897年），康白情（1895年），顾颉刚（1893年），江绍原（1898年），汪敬熙（1898年），孙伏园（1894年），李小峰（1897年），郭绍虞（1893年），俞平伯（1900年），郑振铎（1898年），瞿秋白（1899年），耿济之（1899年），瞿世英（1900年），许地山（1893年），王统照（1897年）。其次，这些“90后”们大多出身于新式的学校，早年也曾接受传统教育，但并未像“先生”们那样，持续到成年。五四运动兴起之时，他们恰好在大学就读（新潮社以北大学生为主，《新社会》群体成员则分别来自燕京大学、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俄文专修馆、中国大学），而且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运动。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成为一时的学运领袖，自不待言，郑振铎、瞿秋白等也都作为各自学校的代表，有相应的作为和表现。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可能缺乏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广阔的视野，但站在

① 傅斯年与鲁迅的通信，《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

② 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第1—1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五四这一崭新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开创起点之上，他们同样是幸运的一代人，身上普遍洋溢了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气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的一段话，颇能代表这代人的心态：

本会同人为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①

过去的人物和势力已丧失了可能性，未来属于我辈青年，一种热烈的自我授权的历史意识，就包含在这样的表述中。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傅斯年在总结青年事业的开展方向时，比较了“民国的先烈”一代与“我们青年”这一代责任的不同：“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一代先烈创造“民国”的业绩何等光辉，而这一代“青年”转向社会重造，去“无中生有”在一盘散沙中创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傅斯年认为这事业的分量和难度“恐怕要重无数倍吧”。^② 代际的比较关联着对历史走向的认识，在傅斯年这里，“自我授权”的意识，更为明确地落实在“造社会”这一紧迫而又艰巨的使命上。

在新文学最初的“戏台”上，“先生一代”无疑是活跃的主角，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鼓吹和大胆尝试，充满争议的新文学才有了可能。但不容否认，这些学者、教授、文人乃至政客们的文学生涯，大多有点“敲边鼓”的性质，除了周氏兄弟这样独异的个体，风潮过后，多数人回归了自己的“本业”或“主业”。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就说：对他而言，文学只是一种娱乐，哲学史才是他的职业。^③ 在《尝试集》出版后，作为新诗发明人的他，也逐渐淡出了诗坛。与“先生一代”相比，“学生一代”与

①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原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1919年5月1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卷，第229—2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② 孟真：《青年的两件事——孟真寄自伦敦》，1920年7月3—5日《晨报》。

③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第3卷，第95—9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文学的关系,似乎要更为紧密,五四之后的新文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他们一手确立。舒衡哲曾用“蛇”与“夜猫”的比喻,来概括《新青年》诸公与新潮社学生们的差异,按照她的解释:“先生一代”往往是激烈的传统批判者、怀疑者;在新潮社成员那里,“新”不再是一种价值取向,而已落实为一种确实的可能性。^①因而,他们具有更强的专业意识,为新文化运动提供学理的、知识的支撑,也是他们工作的重点。^②仅就文学方面而言,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撰写的文学论文,较之师长长辈的宣言或檄文,就有了更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扩张开来看,这也反映了“学生一代”与前代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社会位置方面的基本差异,诚如有论者所概括的:

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③

虽然,日后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但傅斯年、罗家伦、郑振铎等人的文化形象,与后来的“文学青年”们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简言之,在他们那里,文学活动本身尚不能单独成立,对文学的关注勾连了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构图。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傅斯年就特别提出:“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源于不是根本改革。”所谓“根本改革”,即应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而“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

① 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第86—91页。

② 罗家伦在五四一周年之际高调宣称:“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晨报》“五四纪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③ 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3页。在这段话中,所谓五四一代,对应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五四时期的“先生一代”,而“这一代知识分子”指的就是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一代”。

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① 在“根本改革”的总体视野中理解新文学的展开向度,傅斯年的看法体现了典型的五四逻辑。在现实中,新潮社主将们也大多具有较强的行动、跨界能力,他们的身影往往活跃于文学、思想、学术、政治等多个领域。在这个群体中,由于家世及性格的影响,对于所谓文学的“本体”,俞平伯似乎有较多的用心,这也使他多少显得有些“游离”与“独在”。^② 在友人的眼中,恰恰是过于浓郁的文人积习,才导致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一度逃避。^③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王统照等,在五四时期聚集成一个团体,同样表现出对文艺的偏爱,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很早就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团体关注的重心仍是“社会问题”,他们创办的《新社会》杂志,也以社会学的译介、讨论为中心,以至当时已专心致力于文学的王统照,和俞平伯相仿,也似乎成了该群体中另类的一员。^④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郑振铎等人将文学当作一种严肃的“工作”来推进,更多以编辑、翻译家、批评家的身份介入这项事业,其自觉的“工作者”形象,与一般的浪漫文艺家们也迥然不同。^⑤

①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1日。

②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是俞平伯1925年3月所写的一篇论文。所谓“游离”与“独在”,是就文学创作中的“心”“物”之间的角逐、追捕关系而言的:“追来追去,不落后,便超前,总走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游离。寻寻觅觅,终于扑了个空,孤凄地呆着;那是独在。”参见俞平伯:《杂拌儿》,第12页,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③ 1920年初,俞平伯与傅斯年一同赴英留学,但在伦敦仅住了十多天,他就旋即决定回国,傅斯年一路从伦敦追到法国马赛,但未能劝阻。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激烈地批评:“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④ 瞿世英曾说:“彼时大家都喜欢研究社会问题,但是剑三却已经专致力于文学了。所以可以说我们朋友中最先和文学订交的便是剑三。”(瞿世英:《〈春雨之夜〉序》,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第17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瞿秋白是另外一个例子,按照王统照的说法,那时“他虽然对于旧文学早有素养,对于新文艺有努力推动的热情,可是他更热心于整个社会的改革事业”。参见王统照:《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王统照文集》第6卷,第24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⑤ 在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当中,不少人其实在文学创作上并无建树,他们是作为编辑家、翻译家、批评家介入到文学领域当中。譬如耿济之,依照好友王统照的说法:“他一生‘弄’笔墨时候并不算少,但未曾有过任何种‘创作’,即连一首小诗,一则评论的笔记等也似未有遗留。”参见王统照:《追怀济之》,《王统照文集》第6卷,第113页。

或许可以说,对于五四时期的“先生”与“学生”们来说,“文学”作为伦理、思想变革的工具,其价值已充分凸显,但它尚未从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的有机整体中分离出来,尚未落实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场域”、一个有中心和边界的“文坛”。这并非只是历史的一种“过渡”现象,而在根本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战略有关,通过文化、思想、伦理的变革,来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奠定基础,这本身就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政治逻辑,不同“场域”之间的有机联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逻辑之中。

二

191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选派五四运动中的几位学生领袖出洋留学,后称“五大臣出洋”,象征了五四运动落潮之后,新一代精英借助“运动”中聚积的资源,开始进一步展开各自的理想。为了不使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选择学术上的发展,就是新潮社的基本取向,大部分成员在短时间内都留学国外。^①“主角”虽然散了,但新文学的“舞台”并没有就此空下来,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特别是在1922年左右,“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期刊“如尼罗河的泛滥”。^②这些小社团、小刊物,聚集了当时新文学最主要的追随者,即“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年龄、位置、身份以及境遇上,与五四时期的人物也有了显著的差别。考虑到五四之后的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地的青年,一些当时活跃在北京的青年作者,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③:

① 1922年12月27日,新潮社在京同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新潮社的最近》一文,专门提到:“本社社员四十余人,几乎有三十余人是在国外的。”

②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8页,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

③ 以下表格中信息,取自相关作家的传记资料,不再一一注明。

姓名	出生及籍贯	早年背景	来京时间	在京教育状况	1920年代的大致履历
王鲁彦	1901年， 浙江	洋行学徒	1920年	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后在北大旁听	“明天社”成员，后加入文学研究会，辗转各地从事教育工作。
许钦文	1897年， 浙江	小学教师	1920年	在北大旁听鲁迅课程	为了糊口开始写作，参加“春光社”，后以教书、写作为生。
蹇先艾	1906年， 贵州	学生	1919年底	北师大附中，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	与同学组建“曦社”，后从事教育工作。
章衣萍	1900年， 安徽	学校书记员	1919年	曾在北大旁听	“明天社”成员，曾加入“语丝社”，后从事教育、出版工作。
胡也频	1903年， 福建	金铺学徒、 学生	1921年后		曾编《京报·民众文艺周刊》，“无须社”成员。
沈从文	1902年， 湖南	士兵	1923年	曾在北大旁听	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无须社”成员，后以写作、教书为生。
张友鸾	1904年， 安徽	学生	1922年	北京平民大学学生	编辑《京报·文学周刊》，组建“星星文学社”，后为著名报人。
于赓虞	1902年， 河南	学生	1925年	燕京大学学生	原为天津“绿波社”成员，到北京后组建“无须社”，后从事教育工作。
荆有麟	1903年， 山西			世界语专门学校学生	曾编《京报·民众文艺》周刊，参与《莽原》编辑。
徐霞村	1907年， 上海	学生	1920年	中国大学学生，旁听过鲁迅课程	“无须社”成员，后赴法勤工俭学。
台静农	1903年， 安徽	学生	1922年	曾在北大国文系旁听，后入北大国文门	“未名社”成员，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高长虹	1898年， 山西	图书馆 书记员	1924年		开展“狂飙社”事业，参与《莽原》的创办。

并非巧合的是，上述青年作者大部分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比起傅斯年、郑振铎等人，又刚好晚出生了十年，属于鲁迅曾说起的“虽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的一代。^①五四运动发生时，他们因年龄尚小或远离现场，多数没有参与这场运动，更多作为旁观者，感受到了五四的冲击力^②，即使有所参与，甚至担当主力，但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地方性环境中。1920年代初，当他们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五四运动已经落潮，他们也错过了进入历史的最佳时机，只能在运动的“余波”中展开自身的可能性。^③从知识结构上看，无论《新青年》的“先生一代”，还是新潮社的“学生一代”，基本属于精英性的知识阶层，在不同领域各有学问根底；相较之下，这些新文坛上的后来者们，则明显处于劣势，除少部分就读于正牌大学，更多人出身于边缘的二、三流学校，或只是身份模糊的旁听者、自学者。随着新兴出版事业的繁荣，诸多报纸、副刊、杂志以及最新的出版物，成为其中不少人主要的知识来源，沈从文就曾老实坦白，自己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文章，和商务、中华一些翻译小说”^④。对于青年作者知识匮乏、修养欠缺的讥讽，不仅出自立场保守的人士，即使在新文化群体的内部，也往往屡见不鲜。^⑤

①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 沈从文在1948年谈及自己和五四的关系时，这样写道：“虽然不及随同大群学生队伍参加游行烧打，却有机会看到许多因纪念五四的学生大活动，以及相熟许多‘五四’人。”参见沈从文：《五四和五四人》，《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0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③ 蹇先艾曾回忆：“民国八年十二月底我才到北平，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我的年龄当时还小；但是那伟大的运动的余波，却使我心里受了不小的震荡。”（蹇先艾：《我们怎样纪念“五·四”》，《蹇先艾文集》第3卷，第22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919年底，蹇先艾离开老家贵州，来到北京求学，就读于北师大附中，开始与同学组织文学小社团“曦社”，他的经历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颇为典型。

④ 沈从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17页。

⑤ 张奚若1925年10月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著名的《副刊殃》一文，痛斥“副刊”对于文化环境的败坏以及对青年的毒害。鲁迅也曾讥讽高长虹：“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而外一无所有。”《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3页。